

民粹主义: 学术史的考察

董经胜

[内容提要] 民粹主义的学术研究与民粹主义在全球范围内的发展密切相关。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学术界对民粹主义的研究出现了三波高潮:第一波产生于 20 世纪 50 年代美国的麦卡锡主义之后;第二波产生于 20 世纪 30—60 年代拉丁美洲民粹主义的“黄金时代”结束之后;20 世纪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欧洲和拉美新民粹主义的出现,引发了学术界对民粹主义研究的第三次高潮。然而,对民粹主义的理解远未形成共识。除了经济学界将民粹主义看做为实现特定的政治目标而采取的一系列的、经济政策外,政治学界对民粹主义的理解大体分为观念的、策略的、话语的、风格的四种范式。

[关键词] 民粹主义 意识形态 政治策略 政治风格

DOI:10.16502/j.cnki.11-3404/d.2020.05.023

近些年来,伴随着全球民粹主义的勃兴,学术界对于民粹主义研究成果出现了爆炸性增长。有学者做过统计,仅在 1990—2010 年间,大约有 1200 本关于民粹主义的英文著作出版,2010 年后的著作虽无具体数字,但肯定数量可观。^①特别是对西欧的极右民粹主义和拉美的左翼民粹主义的研究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此外,对于其他地区如亚洲、非洲和中东地区的民粹主义的研究成果也相继出现。然而,由于研究者的学科视角、关注对象等因素的差异,对于民粹主义的理解和评价,仍存在巨大的争议。正如厄内斯托·拉克劳(Ernesto Laclau)指出的“当我们称一场运动或一种意识形态为民粹主义的时候,我们从直觉上明白我们所提及的是什么,但是我们在将这种

直觉转化为概念的过程中存在巨大的困难。”^②值得注意的是,学术界对于民粹主义的研究与民粹主义的现实演变是直接相关的,本文的目的在于,结合世界民粹主义的发展历史,对民粹主义的研究轨迹进行一项粗略的学术史考察,为学术界进一步的研究提供参考。

^① Cirstóbal Rovira Kaltwasser, Paul Taggart, Paulina Ochoa Espejo and Pierre Ostiguy, “Populism: An Overview of the Concept and the State of the Art”, in Cirstóbal Rovira Kaltwasser, Paul Taggart, Paulina Ochoa Espejo and Pierre Ostiguy (ed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Populis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p. 10.

^② E. Laclau, *Politics and Ideology in Marxist Theory: Capitalism, Fascism and Populism*, London: New Left Books, 1977, p. 143.

一、民粹主义研究的两次高潮: 20 世纪 50—80 年代

20 世纪 50—80 年代末,伴随着全球范围内民粹主义的发展,学术界对民粹主义的研究出现了两波高潮,第一波产生于 20 世纪 50 年代美国的麦卡锡主义之后,第二波产生于 20 世纪 30—60 年代拉丁美洲民粹主义的“黄金时代”结束之后。

(一) 民粹主义研究的第一次高潮

约翰·B. 奥尔考克 (John B. Allcock) 指出,直到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民粹主义仅仅是指称两个独立不相关的历史现象的标签”,“并没有更为广泛的意义被附加在这个词上面”。^① 他所说的两个历史现象是 19 世纪 90 年代美国人民党运动和 19 世纪六七十年代俄国的民粹派运动。

在俄国,19 世纪六七十年代,一批理想主义的、革命的知识分子认为,农民将是带来俄国社会和政治新生的革命阶级,他们从城市来到农村,“到人民中去”,教育农民,进行一场推翻沙皇政权的革命。然而,这场运动失败了。绝大多数农民不信任、更不追随这些“民粹派”知识分子,甚至向官方出卖他们。“民粹派”赞扬俄国农民未被污染的本质,坚信沙皇政府必须被推翻,从这点上看,“民粹派”与美国的人民党运动具有相似之处。^②

人民党运动是 19 世纪末美国南部和中西部农民反对铁路公司、银行家以及华盛顿政客的运动。作为第三党力量,人民党痛斥共和党和民主党彼此太过相近、与特殊利益关系太过密切,它试图打破美国传统的两党政治。人民党运动体现出民粹主义的特色:它代表“人民”的利益。在这里,“人民”实际上是指农民,特别是指自由、独立的自耕农 (yeomen)。从生产主义 (producerism) 的立场出发,农民被看做是在土地上劳作、创造社会财富 (特别是衣服和食品) 的纯朴的人民;而精英是指东北部的银行家和政客,这些人不生产任何东西,却通过高额信贷从农民手中抢夺财富。在美国的联邦制度中,人民党在地方选举中取得了较大的成功,但在全国层面的影响较小。19 世纪 90 年代,人民党在几个州的议会中拥有席位,但缺少一个全国层面的领导人。因此,在 1896 年总统选举中,人民党支持民主党候选人威廉·詹宁斯·布赖恩 (William Jennings Bryan)。在布赖

恩竞选失败后,人民党运动逐渐衰微。^③

此外,19 世纪末法国的布朗热主义也被一些学者看做早期的民粹主义。1886—1888 年,乔治·布朗热 (George Boulanger) 是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政坛的重要人物。1886 年,布朗热被任命为陆军部长。他捍卫工人利益,宣扬复兴民族主义,反对议会制,试图以激进的公民投票式的共和主义取而代之。1889 年大选前夕,他因被指控谋反和叛国而逃亡国外,1891 年在布鲁塞尔自杀。布朗热之所以声名鹊起,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反对现行的议会制政治,控诉政客腐败、脱离人民;他诉诸于农民、工人、保皇主义者、激进社会主义者等不同社会集团组成的联盟。他还攻击依然多半被看做保皇主义者的精英人士,倡导一种“非正统的民主方案”,即强国家、全民公决式的整体化的民主。^④

19 世纪美国、俄国和法国的民粹主义者之间的共性在于,他们都在不同程度上赞扬“真正的”普通农村居民,这反映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农业在经济中的重要性以及城乡之间的矛盾。更重要的,根据后来学术界对民粹主义的理解,这三个历史案例都体现出民粹主义的根本特征:直接诉诸于本质上品德高尚的、尽职恭顺的、处于弱势地位的“人民”,反对根深蒂固的现行体制,坚信民主政治需要以不同的方式实施,需要更加接近于人民。此外,这三个案例中,民粹主义者都体现出强烈的民族主义和本土的自豪感。

20 世纪初,民粹主义开始出现在拉丁美洲,

① John B. Allcock, “Populism: A Brief Biography”, in *Sociology*, Vol. 5, No. 3, 1971, pp. 371–387.

② Cirstóbal Rovira Kaltwasser, Paul Taggart, Paulina Ochoa Espejo and Pierre Ostiguy, “Populism: An Overview of the Concept and the State of the Art”, in Cirstóbal Rovira Kaltwasser, Paul Taggart, Paulina Ochoa Espejo and Pierre Ostiguy (ed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Populis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p. 3.

③ Cas Mudde and Cirstóbal Rovira Kaltwasser, *Populism: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p. 23.

④ Cirstóbal Rovira Kaltwasser, Paul Taggart, Paulina Ochoa Espejo and Pierre Ostiguy, “Populism: An Overview of the Concept and the State of the Art”, in Cirstóbal Rovira Kaltwasser, Paul Taggart, Paulina Ochoa Espejo and Pierre Ostiguy (ed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Populis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p. 4.

以1916—1922年在阿根廷执政的伊波利托·伊里戈延(Hipólito Yrigoyan)和1920—1925年在智利执政的阿图罗·亚历山德里(Arturo Alessandri)的崛起为标志。伊里戈延和亚历山德里可以被看做拉丁美洲民粹主义的先驱。^①20世纪30年代的世界经济大萧条爆发后,拉美国家陷入了严重的经济衰退,并由此引发了统治制度合法性的危机和民众政治参与的要求。经济困难、农村向城市的大量人口流动以及扩大政治权利和社会权利的日益增长的要求,为民粹主义政治领导人的出现创造了条件。他们通过发表激进的话语,动员以往被排斥的社会集团参政,构建了由不同阶级组成的联盟。由此,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的拉丁美洲出现了经典民粹主义(classical populism)的高潮。其中最典型的例子是阿根廷的胡安·庇隆、巴西的热图利奥·瓦加斯、秘鲁的维克托·劳尔·阿亚·德拉托雷和厄瓜多尔的何塞·马里亚·贝拉斯科·伊瓦拉等。

20世纪50年代在法国产生的布热德主义(Poujadism)不仅标志着欧洲现代形式的民粹主义出现,而且为当今法国的民粹主义奠定了基础。皮埃尔·布热德(Pierre Poujada)在一场抗税运动的基础上,组建了“商人和手工业者联盟”(the Union de Défense des Commerçant et Artisans, UDCA),以一种反体制的情感,捍卫小店主和业主的利益。1956年,“商人和手工业者联盟”成功地将自己的代表选进国会。该运动虽然在1958年的大选之后失去了活力,但其中一名议员让-玛丽·勒庞(Jean-Marie Le Pen)在1970年组建了“国民阵线”,该组织成为当代欧洲右翼民粹主义的旗手。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外交政策遭遇了一系列的挫折,如苏联的崛起、核垄断的终结、所谓“中国的丧失”、朝鲜战争的失利等。所有这些导致美国政治活动和政府中充斥着担忧共产主义颠覆的恐惧情绪。于是在此背景下产生了麦卡锡主义。1950年,参议员约瑟夫·R. 麦卡锡发表演说,声称掌握了一份在美国国务院工作的250名“共产主义分子”名单。随后一系列关于共产主义分子在政府中遍布影响的更为戏剧性的断言(事后没有一项得到证实)接踵而来。麦卡锡也因此得到了广泛的知名度和公众支持。1946—

1955年间,美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反共措施,包括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对联邦官僚机构的清洗和对共产党的取缔。^②

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一些学者开始使用民粹主义这一概念来描述上述一系列的政治现象。民粹主义不再仅仅指称19世纪美国的人民党运动、俄国的民粹派运动和法国的布朗热主义,而是出现了所谓的“概念拉伸”(conceptual stretching)。爱德华·希尔斯(Edward Shils)和西摩·马丁·李普塞特(Seymour Martin Lipset)都将麦卡锡主义看做一种民粹主义的形式。

希尔斯认为,民粹主义应该被理解为一个“广泛的现象……在民众对根深蒂固的、不同的统治阶级强加于社会的秩序抱有怨恨情绪的任何地方皆可出现,这些统治阶级被认为垄断了权力、财产、教养和文化”。他认为,民粹主义有两个核心原则,一是“人民”是拥有主权的、是高居于他们的统治者之上的,这是一种信念;二是“人民”和政府之间的直接联系,这是一种观念。他还归纳了民粹主义的若干特征:不信任政治家和精英、对官僚机构感到懊丧、反智主义和蛊惑民情。希尔斯认为,民粹主义是一种在不同的政治和历史情境下皆可被识别的意识形态现象。^③

李普塞特将民粹主义看做一种排外和反犹太主义的极端现象,可以通过对民粹主义共同的“社会基础”的实证研究来识别不同形式的民粹主义之间的关联。根据李普塞特的看法,这些追随者属于“生活在衰败地区的衰弱的‘自由阶级’,对自己在社会中被削弱的地位感到沮丧,‘他们的不满致使其接受不同的、非理性的抗议性意识形态——区域主义、种族主义、超国家主义、反世界大同主义、麦卡锡主义、法西斯主义’”。^④

20世纪60年代,民粹主义被用以分析越来越多的政治现象,关注点从美国转到拉丁美洲。

① 在国内拉美研究领域, populism 通常被译为“民众主义”,而非“民粹主义”。

② [英]戴维·米勒、[英]韦农·波格丹诺编《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64页。

③ Benjamin Moffitt, *The Global Rise of Populism: Performance, Political Style and Representatio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p. 13.

④ 参见[美]西摩·马丁·李普塞特《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一些学者将民粹主义看做 20 世纪之后在拉美出现的一种城市多阶级联盟,由一位魅力型的政治领袖所领导。托尔夸托·迪·特利亚(Torcuato Di Tella)认为,民粹主义是一种城市劳工的政治运动,得到了其他反对现状的政治集团的支持,但其领导者并非来自劳工。阿根廷的胡安·庇隆、巴西的热图利奥·瓦加斯、秘鲁的维克托·劳尔·阿亚·德拉托雷和厄瓜多尔的何塞·马里亚·贝拉斯科·伊瓦拉被看做是民粹主义领袖的代表。他指出,民粹主义出现的时机是中产阶级中的精英人物产生反抗现状的动机,当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在精英和大众中产生了共同的激情时,不断上升的期望造就了大批可以被动员的市民群体。^①托尔夸托·迪·特利亚试图通过分析拉丁美洲的民粹主义,解释拉美的发展与欧洲的不同之处。后来,随着 1989 年的东欧剧变,他开始把拉丁美洲与东欧进行比较。他将民粹主义定义为“是基于动员起来但还未成为独立组织的平民群体的政治运动,这些民众由扎根于社会中层和上层的精英领导,在领导者和被领导者之间由具有超凡魅力和个人化的领导连接在一起”。在他看来,民粹主义随着社会向现代化推进而发生了变化。^②

基诺·赫尔马尼是一位意大利学者,为逃避法西斯主义迫害,移民阿根廷。在 20 世纪 40 年代,他亲眼目睹了庇隆崛起的过程。他认为,20 世纪初,很多拉丁美洲国家经历的急剧现代化进程为民粹主义的产生铺平了道路。他使用民粹主义这一概念来强调大众社会的兴起如何摧毁了社会联系的传统纽带,以及大量新兴的、可以被与精英阶层对立的运动所动员的民众如何出现。在他看来,民粹主义是一种多阶级的运动,“通常包括截然不同的方面,如要求平等的政治权利和普通民众广泛的政治参与,但同时又融合了以克里斯马式的领袖为首的某种形式的威权主义”^③。

(二) 民粹主义研究的第二次高潮

20 世纪 60 年代初,拉丁美洲国家的进口替代工业化陷入了困境,许多国家的经济停滞、通货膨胀加剧、国际收支状况恶化。受古巴革命的影响,拉美国家的政治走向激进化。在此形势下,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开始,拉美国家发生了一系列的军事政变,推翻了执政的民粹主义政权,建立了军

事威权主义政府。这种政治变化引起了学术界对于民粹主义特别是对民粹主义与进口替代工业化的关系的思考。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产生的依附论学者将拉丁美洲的民粹主义与进口替代工业化联系在一起。吉列尔莫·奥唐奈(Guillermo A. O'Donnell)指出,进口替代的早期阶段为民粹主义的兴起提供了基础。一方面,工业资产阶级为了扩大国内消费市场,适当增加了工人的工资收入;另一方面,工业资产阶级由于自身力量弱小,为了对抗传统的寡头势力(坚持初级产品出口模式的大地主和出口商),也被迫与工人结成了联盟。于是,在拉美形成了一个工业资本家和劳工联合的民粹主义联盟。巴西的瓦加斯、阿根廷的庇隆、墨西哥的卡德纳斯政府就是这种民粹主义的代表。他们通过提高工人工资、改善社会福利、扩大社会下层的政治参与,赢得了广泛的社会支持。^④

在詹姆斯·马洛伊(James Malloy)等学者看来,民粹主义是拉美国家在进口替代工业化早期阶段推行的一种经济和社会政策。经济的增长使得政治领导人通过实施大众包容性的、适度的再分配政策以获取政治支持。这种政策与有利于外国资本、集中经济资源、压制民众需求的排斥性的经济政策针锋相对。^⑤

保罗·德拉克(Paul W. Drake)用拉美的民粹主义来指称三种相互关联的政治模式:第一,民粹主义是指一种易于识别的政治动员模式,运用反复出现的口号和象征以激发“人民”反对他们的压迫者。这种方式依赖于一个充满魅力的、家长式作风的领袖,强调激进的、充满激情的呼吁。他一边挥舞着民族主义的旗帜,一边许诺对社会弱势群体心理和物质需求的即刻满足。第二,民粹

① 转引自[英]保罗·塔格特《民粹主义》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17 页。

② 转引自[英]保罗·塔格特《民粹主义》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17—18 页。

③ Gino Germani, *Authoritarianism, Fascism and National Populism*, New Brunswick: Transaction Publisher, 1978, p. 88.

④ Karan L. Remmer and Gilbert W. Merckx, “Bureaucratic – Authoritarianism Revisited”, in *Latin American Research Review*, Vol. 17, No. 3, 1982, p. 4.

⑤ 转引自 Carlos de la Torre, *Populist Seduction in Latin America*, Athens: Ohio University Press, 2010, p. 2.

主义被描述为一种多阶级的社会同盟,主要是工人阶级,但也包括中层和上层阶级的相当部分,并由后者所领导。社会因素的比例构成在不同的运动之间差别甚大,但是所有的运动都倾向于由“民众”,而非“阶级”所构成。第三,民粹主义还意味着一系列旨在促进经济发展而又不导致阶级冲突爆发的改革政策,避免极端的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寻求国家的整合。它们通常扩大国家干预,通过改善收入分配的措施将工人纳入加速发展的工业化进程,以应对国家的欠发达问题。上述三个特点是相互关联的。从理想的角度看,一个充满魅力的“最高首领”激发一种具有凝聚力的力量,把一个多阶级的联盟聚合在一起,以调和各种不同的政策,分配发展带来的代价和好处。^①

奥唐奈指出,20世纪60年代中期,拉美国家之所以发生军事政变,就是由于进口替代工业化陷入困境,迫使决策层采取紧缩政策,减少对民众的经济分配,加快资本积累,吸引外资,深化工业化进程。要实现这一目标,工人阶级的消费水平和政治动员就必须得到控制。但在进口替代工业化的早期阶段,工人阶级已经组织起来,其经济要求和政治参与水平大大提高,因此,建立镇压性的军人政权成为必需。^②

有学者注意到,这个时期,民粹主义成了一个被广泛使用的“便利标签”(convenient label),用以标识不熟悉和不常见的政治动员形式。^③在此背景下,1967年5月,在伦敦经济学院举行了一次重要的学术会议,来自不同领域的43名学者参加了会议,学科背景涵盖政治学、人类学、经济学、历史学、哲学、社会学等领域,本次会议促进了研究世界不同地区和具有不同理论背景的学者之间的对话。这是一次重要的会议,显示了来自社会科学不同领域的学者对于民粹主义的研究兴趣。1969年,这次会议的论文集出版。^④在该书的导言中,两位主编指出“目前,民粹主义的重要性是毫无疑问的。但是,没人能清楚地回答它是什么。”也就是说,参会者对民粹主义的含义无法达成一个共识,各位学者都“根据自己磨制的学术斧头”(academic axe he grinds)来界定民粹主义,民粹主义被理解为意识形态、政治运动或政治“综合症”(syndrome),以至于该导言使用了一个饶有趣味的标题“一个幽灵,民粹主义的幽灵在

世界徘徊”。^⑤但彼得·沃斯利(Peter Worsley)是一个例外。他向会议提交的论文越出了民粹主义概念的困境,指出了研究的方向。在比较了不同地区的民粹主义现象之后,沃斯利得出结论说:“由于在所有这些‘社会定位’(social locations)中间存在无数的显著差异,实际上任何共同的特征都只能是非常普遍化的。”对民粹主义进行结构性的构建,比如归纳其社会构成、领导权、特定的政策趋向等,都是不可能的。因此,只有回归到上述希尔斯关于民粹主义的两个核心原则,即强调人民主权以及领导人与人民之间的直接接触的重要性,这一概念才有价值。由此出发,沃斯利认为,民粹主义并不必然是一种意识形态或政治运动,而是“一个着重点(emphasis)、一种普遍意义上的政治文化的维度(dimension),而非一种特定的总体性意识形态体系或者组织形态”。^⑥沃斯利的贡献在于,他试图与“发现”民粹主义的传统思路决裂,明确指出民粹主义没有任何“自身概念的纯洁性”(conceptual purity of its own)。民粹主义并非某一特定时期或特定地区的现象,也不是任何政治的意识形态方面的特定堡垒,而是“一系列各种各样的政治文化和结构的一个方面”。^⑦

① Paul W. Drake, “Conclusion: Requiem for Populism?” in Michael L. Conniff (ed.), *Latin American Populism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Albuquerque: University of New Mexico Press, 1982, p. 218.

② 参见[阿根廷]吉列尔莫·奥唐奈《现代化和官僚威权主义:南美政治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③ Yves Mény and Yves Surel, “The Constitutive Ambiguity of Populism”, in Yves Mény and Yves Surel (eds.), *Democracies and the Populist Challenge*,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2002, p. 2.

④ Ghita Ionescu and Ernst Gellner (eds.), *Populism: Its Meanings and National Characteristics*, London: Weidenfeld and Nicolson, 1969.

⑤ Ghita Ionescu and Ernst Gellner (eds.), *Populism: Its Meanings and National Characteristics*, London: Weidenfeld and Nicolson, 1969, p. 1.

⑥ Peter Worsley, “The Concept of Populism”, in Ghita Ionescu and Ernst Gellner (eds.), *Populism: Its Meanings and National Characteristics*, London: Weidenfeld and Nicolson, 1969, p. 245.

⑦ Peter Worsley, “The Concept of Populism”, in Ghita Ionescu and Ernst Gellner (eds.), *Populism: Its Meanings and National Characteristics*, London: Weidenfeld and Nicolson, 1969, p. 247; Benjamin Moffitt, *The Global Rise of Populism: Performance, Political Style and Representatio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p. 15.

正是在沃斯利的影响下,1977年,厄内斯托·拉克劳(Ernesto Laclau)出版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政治和意识形态:资本主义、法西斯主义和民粹主义》一书,为民粹主义的研究奠定了新的理论基础。^①拉克劳指出,他对民粹主义研究的出发点不是探讨历史上被界定为民粹主义的不同政治现象的“社会基础”,而是追究体现“人民”的“关键性的指示物”(key referent)与“核心的能指”(central signifier)是如何在不同的话语体系中被援引和构建的。对拉克劳而言,民粹主义是一种“人民”反对占统治地位的精英和制度的话语体系(discourse)。^②他认为,民粹主义表现为一种全面反对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的大众民主要求。根据他的观点,民粹主义不是在特定的发展阶段的危机时刻出现的,而是产生于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的危机,这种危机又是整个社会危机的一个组成部分;同时,大众民主因素作为反对统治集团意识形态的一种选择,而统治集团内部的某派别可能会利用这一选择。^③也就是说,民粹主义是属于精英阶层的一种思想意识。当统治阶级中的一部分人企图建立霸权地位但又做不到时,就会直接求助于广大民众。^④

1981年,英国政治理论家玛格丽特·卡农范(Margaret Canovan)出版了一部重要的著作《民粹主义》。本书试图完成上述1968年会议的论文集未能完成的工作,即对所有民粹主义的案例进行全面的总结,归纳出共同性,本书将世界民粹主义分为七种类型:农场主民粹主义(farmer's populism)、农民民粹主义(peasant's populism)、知识分子的民粹主义(intellectual's populism)、民粹主义独裁(populist dictatorship)、民粹主义民主(populist democracy)、反动的民粹主义(reactionary populism)、政治家的民粹主义(politician's populism)。然而,卡农范却未能对民粹主义的共同特征做出总结,而是指出,所有不同类型的民粹主义“难以被归结为一个单一的核心”,因为“我们加以区分的各种各样的民粹主义不是同一事物的不同类型,在很多情形下,它们是不同的种类的事物,根本无法直接比较”。^⑤

2000年,保罗·塔格特(Paul Taggart)出版了《民粹主义》一书,试图在卡农范的综合比较分析基础上,总结出民粹主义的核心特征“民粹主义

者敌视代议制政治;民粹主义者把他们所偏爱的群体作为理想化的中心区域,并以此作为辨识自身的依据;民粹主义作为一种思想意识缺乏核心价值;民粹主义是对严重危机的强烈反应;民粹主义因自身的矛盾性而具有自我局限性;民粹主义作为像变色龙一样的东西,能够随环境的变化而变化。”^⑥

二、20世纪90年代以来民粹主义研究中的几种范式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随着欧洲和拉美新民粹主义的出现和发展,学术界对民粹主义的研究出现了又一次高潮,也是50年代以来的第三次研究高潮。

90年代以来,欧洲的右派政党在选举中取得了突破性进展。法国的国民阵线走在前列,不仅成为一个制度化的政党,而且在法国政治中发挥了重要的影响。随后,右翼民粹主义在欧洲迅速崛起,几乎每个欧洲国家都出现了此类政党和一批有代表性的右翼民粹主义政治家,如意大利的西尔维奥·贝卢斯科尼(Silvio Berlusconi)、荷兰的吉尔特·威尔德斯(Geert Wilders)、奥地利的约尔格·海德尔(Jörg Haider)、法国的马丽娜·勒庞(Marine Le Pen,让-玛丽·勒庞之女)等。2000年,奥地利基督教民主党与右翼民粹主义的自由党结盟,引起了整个欧洲的强烈反响。除了右翼政党外,欧洲还出现了左翼民粹主义运动,特别是反对欧盟要求推行的经济紧缩政策的社会运动和政党,如希腊的激进左翼联盟党(Syriza)和西班牙的“我们能”党(Podemos)。

① Ernesto Laclau, *Politics and Ideology in Marxist Theory: Capitalism, Fascism and Populism*, London: New Left Books, 1977.

② Benjamin Moffitt, *The Global Rise of Populism: Performance, Political Style and Representation*, p. 15.

③ E. Laclau, *Politics and Ideology in Marxist Theory, Capitalism, Fascism and Populism*, London: New Left Books, 1977, pp. 172-174.

④ [英]保罗·塔格特《民粹主义》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3页。

⑤ Margaret Canovan, *Populism*,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1981, p. 298.

⑥ [英]保罗·塔格特《民粹主义》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页。

20世纪80年代,拉美实现军政权还政于民的民主化进程之后,研究拉美政治的学者们注意到拉美出现了一波民粹主义高潮,巴西总统科洛尔(1990—1992年)、秘鲁总统藤森(1990—2000年)、阿根廷总统梅内姆(1989—1999年)以民粹主义的政治风格竞选和执政,但是与传统的经典民粹主义不同,他们在上台后,不仅没有推行中左的社会改革政策,反而大力推进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改革。这一轮新民粹主义(neopopulism)的产生引发了关于民粹主义概念含义以及民粹主义与民主的复杂关系的争论。21世纪以来,又迎来了以委内瑞拉的查韦斯、厄瓜多尔的科雷亚、玻利维亚的莫拉莱斯为代表的一轮左翼激进民粹主义的崛起,这些民粹主义者通过推行结构性的改革,削弱精英阶层的势力,将被排斥的社会集团融入政治领域。这一现象进一步推动了关于民粹主义与民主关系的讨论。同时,由于这些左翼民粹主义者在选举和政治上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全球大宗商品市场的繁荣,因而,随着这一繁荣期的结束,本轮左翼激进民粹主义的前景和历史遗产,也成为学术界讨论的话题。

除了欧洲和拉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民粹主义现象也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在美国,不仅茶党在美国政治中异军突起,而且出现了萨拉·佩林(Sarah Palin)、泰德·克鲁兹(Ted Cruz)等民粹主义者。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更作为保守的民粹主义候选人登上了总统宝座。在亚太地区,出现了泰国的他信·西那瓦(Thaksin Shinawatra)、菲律宾的约瑟夫·埃杰西多·埃斯特拉达(Joseph Ejercito Estrada)、澳大利亚的波林·汉森(Pauline Hanson)、新西兰的温斯顿·彼得斯(Winston Peters)等民粹主义者。在非洲,也出现了强有力的民粹主义领导人,如乌干达的约韦里·穆塞韦尼(Yoweri Museveni)、赞比亚的迈克尔·萨塔(Michael Sata)、南非的雅各布·祖玛(Jacob Zuma)。

在这种形势下,学术界对民粹主义的研究兴趣大大提高。一些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加入了研究的行列,特别是在对拉美的研究中。

(一) 经济学视角

鲁迪·多恩布什(Rudiger Dornbusch)和塞巴斯蒂安·爱德华兹(Sebastian Edwards)将民粹主

义定义为一系列的经济政策“它们旨在通过不可持续的高额财政赤字和扩张性货币政策,以及在生产率没有显著提升的情况下提高公共部门工人的工资水平,进行收入再分配。……实行民粹主义宏观经济政策的各个时期,总是以欢欣鼓舞开始,以快速的通胀(有时是恶性通胀)、更高的失业率和更低的工资水平结束。这些政策屡次终食恶果,伤害了那些本应偏向的群体,即穷人和中产阶层。”^①

罗伯特·R.考夫曼(Robert R. Kaufman)和芭芭拉·斯塔林斯(Barbara Stallings)从相对不太严格的经济学视角,将民粹主义看做是为了实现特定的政治目标而采取的一系列的经济政策。这些政治目标是:(1)在有组织的劳工和中下阶层赢得支持;(2)从面向国内市场的企业界得到辅助性的支持;(3)在政治上孤立农业寡头、外国企业和大规模的国内工业的精英。实现这些目标的经济政策包括(但不局限于)以下几点:(1)刺激国内需求的财政赤字政策;(2)通过名义上的工资增长和物价控制以推行收入的再分配;(3)在非出口商品部门实行汇率控制或货币升值以降低通货膨胀、提高工资和利润。^②

根据上述学者的观点,20世纪80年代拉美国家之所以发生债务和经济危机,恰恰是由于在进口替代工业化时期推行这种民粹主义的经济政策所致。显然,这种观点是为90年代中期以后拉美国家推行的新自由主义经济调整提供理论依据的。

(二) 政治学视角

对于新民粹主义的研究,更多来自政治学者。根据一些学者对1990年以来政治学领域发表的有关民粹主义研究文献的粗略梳理,大致可以将其分为结构的(structural)、话语的(discursive)、政治策略的(political-strategic)、观念的(ideational)、社会文化的(socialcultural)几类不同

^① [智]塞巴斯蒂安·爱德华兹《掉队的拉美:民粹主义的致命诱惑》中信出版集团2019年版第178页。

^② Rudiger Dornbusch and Sebastian Edwards, (eds.) *The Macroeconomics of Populism in Latin America*,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1, p. 16; 董经胜《拉丁美洲的民众主义:概念含义的演变》载于《史学月刊》2004年第1期。

研究范式。^①

1. 作为意识形态的民粹主义

以卡斯·穆德(Cas Mudde)为代表的一些学者在希尔斯20世纪50年代对民粹主义研究的基础上,从观念的角度(ideational approach)出发,将民粹主义看做一种意识形态或世界观。穆德指出,虽然学术界对民粹主义的确切特征缺乏共识,但是基本都认可各种形式的民粹主义都在某种程度上诉诸“人民”,公开谴责“精英”。也就是说,民粹主义总是涉及对现行体制的批评和对普通民众的赞美。更具体地说,民粹主义是一种“中心稀薄型”的意识形态(thin-centered ideology),将社会从根本上划分为两大同质和对立的阵营,即“纯朴的人民”与“腐化的精英”之间处于对抗状态,并主张政治应是人民的普遍愿望的表达。与“中心浓厚型”的意识形态(thick-centered ideology)如法西斯主义、自由主义、社会主义等不同,“中心稀薄型”的意识形态,如民粹主义,在形态学上是受限的,它必然依附于(在某些情形下甚至融合于)其他意识形态。因而,民粹主义本身对现代社会产生的政治问题不能提供复杂的或全面的回答,而只能借助于其他意识形态因素来完善其政治方案并赢得民众的支持。这意味着民粹主义可以呈现出不同的形式,取决于民粹主义所借助的来自于其他意识形态的核心概念,以及由此提出的解释性框架。^②

塔格特所说的民粹主义的“空心化”与穆德所说的“中心稀薄型”的意识形态颇有类似之处。塔格特认为,不同于社会主义、自由主义等其他意识形态,民粹主义缺少一种核心的价值,能适应于各种不同的政治立场,或左或右,或进步或保守,或民主或独裁。^③实际上,民粹主义总是依附于其他意识形态因素,在21世纪,欧洲右翼的民粹主义往往依附于民族主义,拉美左派的民粹主义往往依附于社会主义。

2. 作为政治策略的民粹主义

以库尔特·韦兰德(Kurt Weyland)为代表的一些学者认为,民粹主义是一种政治策略,一个个人的领导人以这种策略争取和行使政府权力,该权力的基础是来自大量的、无组织的追随者的直接的、没有任何中介的、非制度化的支持。^④也就是说,由于领导人的人格化本性,以及民众的多

元化,领袖和民众之间的联系缺少制度化的纽带,而依赖于二者之间的直接接触。韦兰德之所以把民粹主义界定为一种政治策略,主要目的是为了使用这一概念来描述20世纪90年代以科洛尔、梅内姆、藤森等为代表的拥有大量民众支持、同时又推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领导人。他认为,这些领导人尽管在群众基础、社会经济政策上不同于20世纪上半期的庇隆、卡德纳斯、瓦加斯等经典民粹主义者,但是,他们获取和维持政治权力的方式,或者说他们的政治策略是相同的。

3. 作为政治话语的民粹主义

以卡洛斯·德拉托雷(Carlos de la Torre)为代表的一些学者认为民粹主义是一种政治话语(discourse)。德拉托雷将民粹主义看做一种政治动员的方式,领导人以强烈的言辞诉诸人民,人民采取群体行动支持领导人。这种言辞将政治构建为人民(el pueblo)与寡头(oligarchy)之间的道德和伦理之争。民粹主义政治依赖于群体行动。为了要求政治参与和融入,群众直接占据公共区域。与此同时,民粹主义领导人利用这些群众来恐吓其对手。群众集会变成了戏剧性表演,民众在其中感到自己成为政治场景的真正参与者。也就是说,民粹主义是一种以魅力型的政治领导为基础的多阶级联盟;一种将社会划分为人民和寡头对立的摩尼教式的、道德的话语体系;一种以国家资源换取政治支持的庇护主义网络;也是一种政治参与的方式,公众和民众的示威游行、领袖的欢呼、以领导人的名义对公共区域的占据被认为比对公民权利的保护、比对自由民主程序的尊重更为重要。^⑤

① Germán Campos - Herrera and Sebastián Umpierrez de Reguero, "Populism in Latin America: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in *Latin American Politics and Society*, Vol. 61, 2019, p. 149.

② Cas Mudde and Cristóbal Rovira Kaltwasser, *Populism: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pp. 6-7.

③ [英]保罗·塔格特《民粹主义》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5页。

④ Kurt Weyland, "Clarifying a Contested Concept: Populism in the Study of Latin American Politics", in *Comparative Politics*, Vol. 34, No. 1, 2001, p. 14; 董经胜《拉丁美洲的民众主义:概念含义的演变》,载于《史学月刊》2004年第1期。

⑤ Carlos de la Torre, *Populist Seduction in Latin America*, Athens: Ohio University Press, 2010, p. 4.

通过对拉美特别是厄瓜多尔民粹主义的研究,德拉托雷将民粹主义的特点概括为以下五个方面:第一,人民和寡头之间的道德、伦理之争是善与恶、救赎与灭亡之争。第二,民粹主义领袖是救赎的象征,而他的对手则是国家一切问题的化身。第三,民粹主义运动是新兴的精英与民众之间的联盟。第四,民粹主义运动是自上而下的政治动员。第五,民粹主义政治与民主制之间存在复杂的关系。^①

可以看出,与穆德、韦兰德不同,德拉托雷将民粹主义看做一种政治表达模式,特别明显地体现在民粹主义领袖的演讲和著作中。在研究方法上,他一方面分析民粹领袖和民众之间的物质交换,另一方面研究民粹主义动员中使用的话语、象征、神话和仪式。通过这种研究方法可以获得一些新的发现,但同时也可能由于样本的选择等得出不可靠的结论。

4. 作为一种政治风格的民粹主义

本杰明·墨菲特(Benjamin Moffitt)将民粹主义界定为一种政治风格(political style),这种政治风格有三个特点:第一,“人民”与“精英”的对立。将社会划分为“人民”和“精英”两大对立的阵营,“人民”应享有主权。诉诸“人民”意味着反对体制和反对精英的所谓“政治正确”,以此来显示民粹主义者真正了解人民所想,表明民粹主义者来自体制之外。第二,不良的举止(bad manners)。民粹主义者诉诸“人民”的方式是政治表达方式的粗俗化,不在乎政治领域所谓的“适宜”规范。例如,在政治活动中使用俚语、发誓、发表违反政治正确的言论、在穿着上随意花哨等,以此区别于精英阶层的刻板、理性、体面以及使用专业术语等。第三,对危机、崩溃或威胁的驾驭。民粹主义者从社会对危机、崩溃或威胁的感受中获取动力,与此同时,通过他们的戏剧化表演引导危机,以此来造就需要采取决定性行动的氛围。这种对危机、崩溃或威胁的操纵旨在造成对现代管理和政治解决程序的不信任,因为这些程序复杂,需要协商、调查、规划、实施。与此相反,民粹主义者支持迅速的、直接的行动,而在危机、崩溃等情况下,这种行动方式易于得到支持。^②

除墨菲特外,阿兰·奈特(Alan Knight)也认为,民粹主义是一种“政治风格,其特点包括明确

宣布与‘人民和谐相处、一种他者和我们对立的心态以及(虽然经常并非必需的)一个危机和动员的时期’。他指出,简单地说,民粹主义就是“从事政治的一种方式”(the way of doing politics)。^③

以上对于民粹主义研究的发展历程梳理以及对不同研究范式的概括和分类绝非全面和准确的,实际上各种不同范式之间既有区别也有联系。在实证研究中,有的学者遵循一种理论范式,也有的同时运用不同的理论范式。英国拉美史专家莱斯利·贝瑟尔(Leslie Bethell)在对上述理论范式进行归纳总结后认为“可能最好、也是最简单的理解是,民粹主义是包含那些运动和政党的政治现象,通常但并不总是具有‘克里斯马式的领导人,宣称通过某种直接的、或者半直接的、不经任何中介的方式联系并认同于‘人民’,特别是那些原来被排除在政治之外的通常是第一次被动员起来的人群,来反对由‘精英控制的既定权力结构(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知识的和文化的),追求权力,获得权力(通常,虽然并不总是通过选举)行使权力和维持权力。”他认为,民粹主义是一种政治实践、政治策略、政治语言,而非一种类似于自由主义或者社会主义甚至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作为意识形态,民粹主义总是兼收并蓄的、含糊的、混乱的,不值得严肃对待。^④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历史学系。

[责任编辑:文丰]

① Carlos de la Torre, *Populist Seduction in Latin America*, Athens: Ohio University Press, 2010, pp. 199-200.

② Benjamin Moffitt, *The Global Rise of Populism: Performance, Political Style and Representatio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pp. 43-45; 董经胜《拉丁美洲的民粹主义:理论与实证的探讨》,载于《拉丁美洲研究》2017年第4期。

③ Alan Knight, “Populism and Neo-populism in Latin America, especially Mexico”, in *Journal of Latin American Studies*, Vol. 30, No. 2, 1998, p. 223, p. 234.

④ Leslie Bethell, “Populism in Brazil”, in Leslie Bethell, *Brazil: Essays on History and Politics*, London: Institute of Latin American Studies, 2018, p. 175.